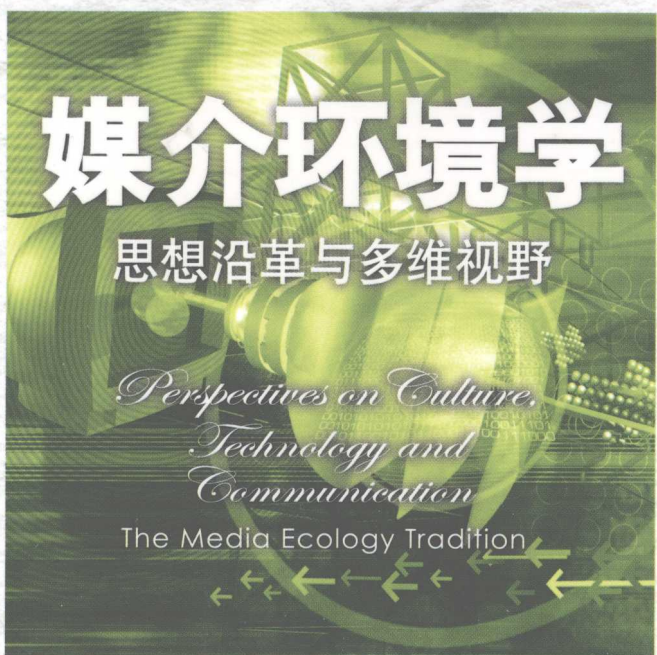




〔美〕林文刚 (Casey Man Kong Lum) 编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

MEDIA ECOLOGY SERIES

Media

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美〕林文刚 (Casey Man Kong Lum) 编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66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美)林文刚(Lum, Casey M. K.)编;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

(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

ISBN 978-7-301-12867-1

I. 媒… II. ①林…②何… III. 传播媒介-环境学-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2079 号

Copyright © 2006 by Hampton Press, Inc.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 Hampton Press 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著作责任者:〔美〕林文刚 编 何道宽 译

责任编辑:周丽锦 杨 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867-1/G · 22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52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编委会

顾问：陈世敏（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林文刚（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传播学教授，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

主编：何道宽 吴予敏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力丹 程曼丽 丁 未 葛 岩 胡翼青 李蕾蕾 李明伟 潘晓慧

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导师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感谢他出类拔萃的思想。



总 序

自 20 世纪中期传播学大发展以来,世界各地的传播学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新媒介、新媒体、新传播形式迅猛发展、快速更新的推动之下,传播学大有发展成为显学的势头。

长期以来,国内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是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所谓经验学派是以实证主义为信条、技术统计为手段、效果研究为焦点、服务体制为导向的美国主流学派。所谓批判学派则以德国法兰克福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批评以及欧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

新千年以来,各国传播学界拓宽视野,开始瞩目以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代表的第三学派。

20 世纪末,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为媒介环境学派,组建了媒介环境学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分梳,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对国内学界和读者并不陌生,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除麦克卢汉之外,哈罗德·伊尼斯、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詹姆斯·凯利等人的代表作都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研究他们的文章也日渐丰富。

然而毋庸讳言,国内学界对这个学派的阵容、思想和成就的了解还不深刻,把以上代表人物放进媒介环境学派的视野中研究十分

必要。

把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的鼓吹者是莫大的误读,把 media ecology 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我们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理由是:(1)从这个学派使用 ecology 的意义来看,ecology 是亚里士多德原本使用的“家居环境”,并不能和今天的“生态”画等号;(2)media ecology 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使人注意媒介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媒介环境学”的定名使人重视该学派人文主义(humanism)的关怀,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潮;(3)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关注的焦点是媒体之间的生态、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界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和北美的 media ecology 不是一回事。

媒介环境学的显著特点是:(1)具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关注技术、环境、媒介、知识、传播、文明的演进,跨度大;(2)主张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媒介论,关注重点是媒介而不是狭隘的媒体;(3)重视媒介长效而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4)怀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

媒介环境学从 20 世纪初开始孕育,走过了三代人的历程。

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等。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阿尔弗雷德·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沃尔特·翁(Walter Ong)、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和唐纳德·F.特沃尔(Donald F. Theall)。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约书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等。

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思想和中华文明的和谐思想颇为吻合。它关注的首先是宏观的媒介环境,而不是眼前的那一点点媒体的运行规律,它有助于我们拓宽历史、哲学和人文研究的视阈。

何道宽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 年 6 月



林文刚之中文版序

本书为理解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的历史沿革勾画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媒介环境学旨在研究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媒介环境学派有着深厚的思想传统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反映在许多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北美和欧洲学者的著作之中。

本书的总体框架以我执教的研讨班教学内容为蓝本,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在纽约大学给媒介环境学研究生上的必修课。我并非讲授该课程的第一位教师,也不是唯一的教师;曾经讲授过这门课程的老师有尼尔·波斯曼、特伦斯·莫兰和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他们三人创建了纽约大学的媒介环境学学位点。其中,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界最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思想奠基人和制度奠基人。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同时承担一些教学任务,受业于波斯曼、莫兰、尼斯特洛姆和亨利·珀金森门下;珀金森出身哈佛大学,通教育史、精教学法。此间,我对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和思想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史尤其感兴趣。原因之一是,我有志于研究媒介环境学;另一个原因是,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传播研究的传统中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我禁不住要问:这个研究文化、传播与技术的理论,学养深厚,且横跨多门学科,但它却长期被排挤到传播学领域的边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毕业几年之后,波斯曼、莫兰和尼斯特洛姆邀请我回母校执教,去讲授媒介环境学这门课程,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门课围绕四个核心课题展开:(1)媒介环境学的界定性理念、理论或主题,

文化、技术与传播的关系；(2)这些思想背后的主要学者，比如刘易斯·芒福德、沃尔特·翁、哈罗德·伊尼斯、雅克·艾吕尔、马歇尔·麦克卢汉、苏珊·朗格、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诺伯特·维纳等；(3)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语境；(4)当代学者如何运用这些理论。

因为没有一本书能够涵盖上述几个课题，所以我们要求研究生阅读一些精选的经典文本，要他们研读对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做出贡献的原著。毋庸赘言，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要帮助他们对经典进行适当的综合，以确保他们有所收获。在教学过程中，我深感有必要为传播学师生编写一本介绍媒介环境学的入门书，它同时应该惠及其他读者（比如媒体艺术家、制作人或决策者），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和行为会影响到媒体和社会的发展。这本书从历史、理论和诠释的角度记述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源头；与此同时，它又围绕以上几个重要课题进行综合与分析，以便给读者提供具体的帮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就开始在纽约和新泽西地区讲授媒介环境学的几门课程，但直到很晚之后，我才有机会在中国宣讲并研究与媒介环境学相关的课题。我第一次在亚洲公开宣讲媒介环境学是1998年6月，地点在中国台湾。那是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CCS)的第二届年会，我宣读的论文是《媒介环境学与美国传播学动态》。会议由中华传播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CCS)和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联合主办，当时我担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在筹办会议期间，有幸结识了中华传播学会会长、著名传播教育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世敏博士。

一年之后，即1999年6月，通过陈教授的安排，我应邀到台湾政治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为老师和学生讲“媒介环境学的生物学和认识论暗喻”。随后，我用中文发表了几篇相关课题的论文，分别是：《论传通教育课程内的传播科技：一个浮士德的交易？》（林，1999）、《什么才是华人传通问题：中华传媒生态文化史初探》（林，2000）、一篇介绍媒介环境学思想史的文章（林，2003a）和一篇论芒福德学术成就的文章（斯特拉特和林，2003b）。

此后，我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就媒介环境学的各个方面发表讲演，讲演的学校有：北京大学(Lum, 2002a, Lum, 2002d)、北京师范大学(Lum, 2002b)、清华大学(Lum, 2002c)、华中科技大学(Lum, 2004)、香港浸会大学(Lum, 2006a)和深圳大学(Lum, 2006b)。除了正式讲演之外，我在以下大学与同行围绕媒介环境学进行过交流：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大学和中京大学。在此期间，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和发表讲演时，我发现了中国大陆媒介生态学的兴起；有趣的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常常以 media ecology 作为媒介生态学的英语翻译。

毋庸赘言,本书不是对中国媒介生态学所做的研究,本序也不适合对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和北美的媒介环境学进行比较。不过我认为,如果不做适当的解释,人们很容易给媒介环境学和媒介生态学画上等号,仿佛它们的思想—历史源头、学说内容和范式内容是一样的。

在某种层面上,“生态”一词仿佛是一个显而易见、符合逻辑甚至有充分说服力的术语。毕竟,在传统的英汉词典里,ecology 的译文就是“生态”。更为重要的是,(北美传统里的)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是媒介系统,其研究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此外,媒介环境学还关心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然而,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源头和范式源头超越了“生态”的生物学暗喻,用“生态学”直译媒介环境学不能涵盖它的全部范围。

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 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发表的讲话中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媒介环境学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概念: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共生关系)。这些概念显示,媒介环境学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重点关怀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①

在某种层面上,媒介环境学的兴趣在于:在界定人类传播的性质、结构、内容和结果方面,媒介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概念出发,不同的媒介继承和体现了不同的形式—传播结构(formal-communicative structures)。因此可以说,既然媒介是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既然它是“联系”人的“渠道”,不同的媒介(或媒介形式)就会给人的传播提供不同的结构,就促使人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比如,两个人打电话交谈的性质、结构和结果,与电影导演和观众交流的性质、结构和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个层次上,媒介环境学者把社会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或者比较宽泛地说,他们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或媒介与文化的共生关系。

在另一个层面上,当人们把符号环境或感知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时,人们和媒介的关系就不是肩并肩的关系。此时,媒介环境学感兴趣的是,人们感觉、感知、体会、思考、认识、理解和再现周围世界的方式,如何受传播媒介固有的符号性质和感知性质的塑造。这里的理论预设是:不同的媒介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如何感知、认识、思考、理解和表征外在于人的世界。比如,作为文字的

^① 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 media ecology 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

媒介固有的符号和感知的结构或特征,对小说家如何看待和讲述周围世界的故事,起到什么样的“塑造”作用呢?又比如,文字(比如小说)里观照的“世界”如何有别于视听媒介(比如电影)里观照的“世界”呢?换句话说,人们并非置身于他们使用的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可以说,他们置身于媒介之中。在这个层次上,媒介环境学者把媒介当作符号环境和感知环境来研究,更加宽泛地说,媒介环境学者研究媒介与意识的关系,或者说媒介与思维过程(minding process)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 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它同时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主义(human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媒介环境学诞生的时代,正是许多美国社会政治思想家和行动主义者指称的“喧闹的 20 世纪 60 年代”,这是目击许多反体制运动的年代。当时,对许多第一代的媒介环境学者比如刘易斯·芒福德和尼尔·波斯曼而言,“践行”媒介环境学和“研究”媒介环境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媒介环境学的天然使命是促使这个世界成为更加适合人生存的地方和环境(不是生态)。比如在波斯曼的一篇重要文章《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见本书第二章)里,他就做了这样的阐述:

亚里士多德使用“生态”(ecology)的本原意义是“家庭”或“家居环境”(household)。他说的意思是让我们的家庭保持精神上的安稳,强调精神安稳的重要性。生态一词的第一个现代意义,是 19 世纪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赋予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意义,即自然环境里诸元素的互动,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互动如何产生一个平衡而健全的环境。在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里,我们把媒介放在生态前面,意思是说,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媒介,我们还想说,媒介与人互动的方式给文化赋予特性,你不妨说,这样的互动有助于文化的象征性平衡。如果我们想要把生态一词的古代意义和现代意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妨说,我们需要使地球这个大家庭维持井然有序的环境(Postman, 2000, pp. 2-3)。

换句话说,根据波斯曼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关怀,根据媒介环境学的一般原理,我们必须应用媒介环境学的知识,使世界成为更加“平衡”或“健康”的符号环境或媒介—文化环境,以便使人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我把“平衡”、“健康”和“美好”这三个词放进引号里,因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家和践行者在好坏问题上的确做出了各自的判断或社会道德决断。波斯曼和韦因加特纳(1969)在《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里,敦促老师和学生使用电子媒介的“新语言”,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的学校专心致志进行的教学紧紧围绕着印刷媒介,由此造成了媒介环境的不平

衡,因而就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同理,10年之后,波斯曼在另一本经典著作《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里,似乎来了一个180度的“逆转”。他主张重新强调印刷媒介和印刷词语,因为他看到,图像尤其是电视图像在那时的美国文化中日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

至于波斯曼对美国文化状况的解释或判断是否正确,这不是此地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毕竟,在波斯曼课堂内外耳提面命的教诲之下,我看到他尊重各种各样的阐述和意见(当然,他真正相信并坚守自己的观察、意见和信念)。相反,重要的是牢记。波斯曼在漫长而杰出的学术生涯里,身体力行地体现和阐述了人文关怀的行动主义,这样的主张牢牢地扎根在他的媒介环境学思想体系里:认真负责的公民要发出异见的声音、提供反制的力量,以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当环境里的力量关系不平衡时,或一种力量君临其他力量之上时,他们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咄咄逼人的力量可能是教育体制里抗拒变革的、正统的印刷媒介,也可能是图像密集的电视文化,还可能是一种信仰,因为有人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社会弊端的万能药方。

我还想强调指出,波斯曼并非在学术和公共领域里体现这种行动哲学的唯一的媒介环境学人。比如,自20世纪初起,芒福德就是北美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之一;在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城市发展和更新、地区规划、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等方面(见本书第三章),他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又比如艾吕尔,他一贯主张,精神关怀有助于我们抗衡甚至战胜人对技术的屈从,有助于抗衡技术至上的心态。詹姆斯·凯利是媒介环境学领域另一位引人注目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始终提倡并践行这样的思想:媒介能够并且应该被用作一种民主的力量。在行动主义的层次上(无论思想、社会或政治上的行动主义)和公开主张(public advocacy)的层次上,你可以把媒介环境学看成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因为媒介环境学能够或应当对常规的主流思想起到制衡的作用。媒介环境学视野应当推动我们思考,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去制衡主导的力量,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有助于维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的平衡和平稳,有助于个人心态、精神和思想生活的平衡。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我和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许多同行和学生的交谈,使我获益匪浅,我对中国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有了很多感性的认识。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忱。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主张和支持媒介环境学,帮助我思考中国语境下媒介环境学里一些最艰难的问题,帮助我出版本书的两个中文译本。在许多方面,用许多尺度来衡量,他都是我的学长,在推进媒介素养和媒介教育方面,他和我怀抱同样的激情。与此同时,我对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和语言文化专家何道宽教授深表谢忱,感谢他精心完成的这个出色

的译本。他对媒介环境学理解深刻,热情有加,十多年来出版了很多有关媒介环境学的文章和译作,特别阐释和褒扬了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学术成就。陈世敏教授和何道宽教授为媒介环境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在这里向这两位学长前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真诚地希望,本书对中国和北美的思想交流能够发挥一点微薄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希望,在扩大媒介技术的影响方面,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林文刚

2006年8月8日于纽约

参考文献

Lum, Casey M. K. (1998). Media ecology and rec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Taiwan, China.

Lum, Casey M. K. (1999). 《论传通教育课程内的传播科技:一个浮士德的交易?》,载《新闻学研究》,58:269-283。

Lum, Casey M. K. (2000). 《什么才是华人传通问题:中华传媒生态文化史初探》,载《传播研究简讯》,22: 11-13.

Lum, Casey M. K. (2002a, January 8). Media ecology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a and culture. A speech given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Lum, Casey M. K. (2002b, January 9). Explor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A speech given at Schoo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um, Casey M. K. (2002c, May 21). Media ecology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theories. A speech given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Lum, Casey M. K. (2002d, May 30). Lewis Mumford's megamachine and modern global media. A speech given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Lum, Casey M. K. (2003). 《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中国传媒报告》,4(2): 4-16.

Strate, Lance, and Lum, Casey M. K. (2003). 《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载《中国传媒报告》,5(3): 30-45. (这是二位作者合作的第一篇被译为中文的文章,原文发表于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0,8(1), 56-78.)

Lum, Casey M. K. (2004, June 24). Understanding media ecology as a theory of min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A speech given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

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Lum, Casey M. K. (2006a, January 13). The concept of theory groups and the writing of communication intellectual history (ies). A speech given a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um, Casey M. K. (2006b, May 24). The rise of media ecology as a theory group in North America. A speech given at Institute for Media and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enzhen University.

Postman, N. (1970). 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A. C. Eurich (Ed.), *High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pp. 160-168). New York: Pitman.

Postman, N. (1979).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 Delta.

Postman, N. (2000).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New York.

Postman, N. , and Weingartner, C. (1969).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何道宽之中文版序

一、缘分

1980年,我在留美期间读到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就和媒介环境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26年有余。

1987年夏天,我着手翻译这本传世之作,开始引介媒介环境学派,迄今将近20年。

新千年的第一年,我开始认真研究媒介环境学派,迄今发表论文七篇:《麦克卢汉在中国》、《媒介革命与学习革命》、《媒介即是文化》、《硕果永存——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述评》、《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和《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

2000年至今,我出版的译著大多数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经典或名著,这些译作是:《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思想无羁》、《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手机:挡不住的呼唤》、《机器新娘》、《麦克卢汉书简》、《麦克卢汉如是说》、《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等。

我现在参与主持的四个传播学译丛和媒介环境学关系密切,它们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麦克卢汉研究书系》、《莱文森研究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今后的几年里,我的研究重点之一注定是媒介环境学。

二、三分天下

如上所示,迄今为止我的研究重点是多伦多学派。2005 年开始,我的目光开始投向纽约学派。这是媒介环境学的两个重要学派。

多伦多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一共有四人: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埃里克·哈弗洛克和埃德蒙·卡彭特。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已经广为人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关注这一思想圈子里的其他学者。

如今活跃在多伦多学派里的代表人物有唐纳德·F. 特沃尔(D. F. Theall)、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等。

纽约学派的领军人物尼尔·波斯曼于 2003 年去世,但纽约学派的薪火却越烧越旺,如今该学派最活跃的学者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林文刚、兰斯·斯特雷特等。

1998 年组建的媒介环境学会就是以纽约学派为骨干,如今这个学会正在把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学者团结起来,问鼎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成为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大学派。

林文刚博士撰写和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说明,媒介环境学派进入了自觉反思、系统总结、清理遗产、推陈出新的阶段。

三、定名

这个最后崛起的学派叫什么名字好呢?它既是麦克卢汉研究、伊尼斯研究、波斯曼研究,又不完全是对这些个别学者的研究。学派的定名始于 1968 年,英文叫 media ecology,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办了 media ecology 专业和博士点。Media ecology 的中文译名起初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关注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应该怎么翻译才妥当呢?

2005 年秋,李明伟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深圳大学任职。自此,我们开始切磋北美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里的所谓“形态理论”就是北美的 media ecology 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强调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同时,丁未博士从复旦大学到深圳大学任职,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凯利的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于是,我们三人就开始考虑北美 media ecology 学派的译名问题。

去年底和今年初,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

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切磋这个北美传播学派的译名。以后,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 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被一一放弃了。

四、长短

林文刚教授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既是介绍媒介环境学派的入门之作,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小百科全书。

林文刚教授现任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是媒介环境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是媒介环境学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他活跃于北美传播学界和中国传播学界,近年频频在中国进行交流和讲学。

该书的12位撰稿人,除已故的波斯曼教授之外,均是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学者。

该书共14章,除编者林文刚的序、跋和波斯曼的讲演辞这3章之外,其余11章用纪传体的方式描绘并评价了10位媒介环境学的先驱、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他们是尼尔·波斯曼、刘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吕尔、马歇尔·麦克卢汉、哈罗德·伊尼斯、詹姆斯·凯利、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沃尔特·翁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该书凸现四个焦点:(1)媒介环境学的基本理念、理论和主题,即理论价值和学派地位;(2)文化、技术与传播的关系,即本书的多维视野;(3)上述理念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即学派的现实关怀;(4)媒介环境学的现实意义,即该理论旺盛的生命力。

媒介环境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是比肩而立的三大传播学派。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上,对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则用力不够、着墨不多。本书的出版有助于纠正这个偏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给中国传播学提供新的参照系并注入新的活力。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是媒介环境学思想传统、经典文本和多维视野的集萃,是该学派第一部自觉反省的历史记述式的思想批评之作,它系统地提炼、归纳和阐述了该学派从萌芽、诞生、成熟到壮大的历程。由于其杰出贡献,在2006年媒介环境学会的评奖中,本书击败了34个竞争对手,在候选的35部著作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刘易斯·芒福德杰出学术成就奖”。颁奖辞里有这么一段话: